



教研相长七书

JIAO YAN XIANG 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 农村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研相长七书

JIAOYAN XIANGZHANG QI SHU

行龙◎主编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 农村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 行龙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291 - 1

I. ①集… II. ①行… III. ①农村—社会问题—研究—山西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9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湑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研相长七书”总序

“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20 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 年 5 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 106 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 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

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10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10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们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

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 14 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① 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9 页。

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 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前 言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与《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一样，均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毕业论文选编而成，读者诸君不妨将此两书看作姊妹篇。

2003 年以来，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逐渐成为本中心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围绕这个领域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论文已有数十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我在《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的“编者前言”中，曾经感叹此领域的开拓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话虽如此轻松，但实际工作中师生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力和心力。

近十年来，我们下大力气抢救式地收集散落在基层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师生长年累月，不辞劳苦，栉风沐雨，寒暑不辍，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一茬又一茬的研究生毕业离校，一批又一批的档案整理入柜，每一位在中心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都经过了收集整理资料的学术训练，都有一份田野工作的辛苦与收获，真可谓甘苦备尝，冷暖自知。

眼下，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回头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过程和成果，尤其是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些许收获，实在是很有必要的。本书从近年来数十篇硕士论文中经作者删改选取十篇，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收入，这是需要诸位同学谅解的。

又，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之前曾在相关学术刊物发表过，特此说明。

自 2002 年《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以来，时间已过去 15 个年头。白驹过隙，岁月如流，教书育人的责任却永驻心头。

行 龙

2016 年 8 月 28 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目 录

革命与医疗

- 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 (1)

村庄叙事

- 1937—1957 年的赤桥社会 (19)

集体化时代吕梁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初探

- 以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例 (54)

20 世纪 50 年代山西农村读报小组研究 (76)

集体化时代农民婚姻行为研究

- 以平遥县道备村为中心的考察 (107)

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

- 以平遥县道备村为中心的考察 (134)

国计民生

- 1950 年代初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研究 (152)

乡村众生与社会变革：土改中不同阶级的参与及其应对 (186)

土改后至高级社前家庭经济分配研究

- 以山西永济西坦朝为例 (210)

中与西

- 赤脚医生的技艺与村民的选择 (253)

革命与医疗

——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

刘轶强^①

“以一定的地域范围来研究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实践效用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② 20 世纪 40 年代的山西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它既是国共合作抗战的中心，又是国共内战的重心之一。反映到史学研究上，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战争与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宏大问题，以事件、制度乃至器物为研究重点，而忽略了对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内容的研究。在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方面更是一个薄弱环节，比如医疗资源变化、公共卫生状况、医者的地位、疾病和医学的变动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等，成果很少。有些问题，虽已有所涉猎，但限于研究基础、资料和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不够深入。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待研究者的介入和挖掘。

本文以 20 世纪 40 年代的太行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的视角

^① 刘轶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5 届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② 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出发,通过对这一区域特定时期内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来展示历史变迁中的这一重要侧面。把对疾病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对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变动、民众的心态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它呈现的是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了太行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太行根据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巩固的政权,使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乡村的层面,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战争中健康的人是至关重要的胜利因素之一,不论是作为生产中的劳动力还是战争中的兵员,健康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使得战时的医疗卫生工作变得非常重要。加强医疗卫生工作,必须改变原有的医疗状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疫病的医疗卫生体系。非如此则不能建立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为战争输送有生力量。1945年11月,太行行署成立卫生科,既开展医疗业务,又负责卫生管理事业。1947年4月成立太行卫生社,负责全区卫生行政事宜和具体的防疫治疗工作。^①

1942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根据地摆脱了经济困境,而且还告诉了共产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实现“人财两旺”。“没有开展大生产是人财两不旺;已开展大生产的则是财旺人不旺”^②;只有做到开展大生产的同时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才能做到“人财两旺”,才能使战争有保障,胜利有可能。医疗卫生的主要力量是医疗机构和医生。因此,建立相应的医疗卫生体系,加强对医生的领导和管理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太行根据地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落后小农经济地

①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41卷《卫生医药志·卫生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9页。

② 健秋:《加强群众的卫生防疫教育,减少疾病死亡》,《教育阵地》5卷2期。

区。在医疗卫生方面,其发展水平、行医模式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太行山地区的医疗主要通过分散的、个体的民间中医和零星的西医来实现。

抗战以前,太行山区的医疗主要依赖中医,有世代相传的名医、有半路出家的学徒,还有走街串巷的郎中。他们或挂牌应诊兼业求生,或走方行医游食四方,中医人才的教育培养,数千年来一直沿用家传、师授、自学的传统授业方式。这样的民间医疗体系,相互间少有联系,各自以生活居住的村镇为原点向外辐射,因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多数乡村医生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故难以对多发、频发的疫病实施有效的控制。

中医的行医方式主要是兼业和走方两种。这种行医方式是适应乡村实际情况出现的,有利有弊。兼业医生多为看病不收“脉礼”,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医生所居地区偏僻,经济条件差,人口少,单纯以医为业,靠诊费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故自开药店,看病时免收诊费,谓之“送诊”,将卖药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以药养医。兼业医生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大多不高,难以承担防疫治病的责任。

走方是中医行医方式中很有特色的一种,此类医生无固定行医场所,身背药囊,装有随备药品,周游四方。走方医病开出的处方可由病人自买,多平淡无奇。随售的丸、散、膏、丹皆系自备秘制,是取效的关键。走方医中少数人得有师傅真传,医术高超,品德高尚,贵义贱利,持有历练不爽的经验良方,能治一般医生感到棘手的奇难大症;也有不学无术、专以兜售假药骗人钱财聊以谋生之徒。

可以看出,中医传统授业方式客观上存在两个根本缺陷:其一,担当培养教育的是个人,很难在理论、经验两方面都博大精深,普遍是长于理论则短于经验;富于经验而又短于理论;临床各科精于此而疏于彼。因而家传、师授以及自学者,不能接受全面系统的中医教育。其二,个人传业,范围狭小,能力有限,培养人数自然不可能很多,也就难以满足医疗防疫不断增长的实际需要。兼业和走方的个体行医方式具有行医规模小、范围小和医疗技术难以提高的缺陷。太行山区交通不便限制了其发展的规模和救治的范围,社会经济贫困也使其只能局限于维持生计,这就造成了根据地内传统中医的点状分布与各自为政,相互间没有联系与合作,诊疗治病完全依靠个人经验和家传秘方,因此其只能应对日常普通疾患的发

生，根本不具备有效控制大规模疫病流行的能力。

19 世纪 80 年代，西方医疗技术传入山西。以清光绪六年（1880）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在太原府创办首家西医教会诊所为开端，外国教会纷纷在山西大中城镇开办诊所和医院。与中医分散的个体行医方式不同，西医从一开始就以整体形象出现，并很快融入日益近代化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中。西医以其先进的医疗理论和治疗手段被称为“新医”，而直接将中医压迫为“旧医”，也就是说原本应是两个不同体系的并列学科，却有了优劣之分。在近代中国追求近代化的大背景下，“抑中扬西”一时间成为潮流，国内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医、废止中医的思潮，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但西医的强势崛起并不足以对中医构成致命的威胁。西医的传入由城市开始，它的优势地位也主要确立于大城市以及城市周边的城镇，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是相吻合的，“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①。这种不平衡性的论述对西医的状况也同样适用，西医人员的稀缺及其集中于城市的特点，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正如杨念群所论述的：“家庭诊所的一体化构造，师徒单线的私密性授传，经验主义方式的诊疗模式，和草根般的药物配制程序，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却都在仿佛阻碍着西医向中国乡村社会渗透进发的步伐。”^②同时，中医在人数上的优势同样制约着西医在乡村中统治地位的确立。表 1 是 1949 年晋城等四个县的中西医人数比例表，以此为参照可以大致判断出抗战前的情况应与之相似。

表 1 晋城等四县中西医人数比例表

县 份	中医人数	西医人数	中西医人数比
晋城县 ^③	307	43	7.1:1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② 杨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读书》2003 年第 7 期。

③ 《晋城县鉴定医生花名统计表》，1949 年 7 月 12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196-1-22-6。

续表

县 份	中医人数	西医人数	中西医人数比
陵川县①	193	22	8.7:1
垣曲县②	96	14	6.8:1
涉 县③	46	8	5.7:1

据此,无论是城市中以西医为主体的近代国家医疗体系,还是西医在城镇中的短期繁荣,都难以将西医的广泛影响延伸至太行山区。因而,在太行山区西医也是以零散的个体形式出现,他们与中医的医学背景虽然不同,但“单打独斗”的行医方式却毫无二致,加之数量稀少,根本无法完成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双重使命。

医疗卫生状况在抗战爆发后的动荡社会环境下更加恶化。在战争环境下,人们失去了安定的生活规律和基本的生活保障。流离失所又使民众体质下降,且易招致外伤和灾病,加上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法,对根据地实施野蛮屠杀的同时,施放毒气、散发毒菌,一时疫患猖獗,危害甚巨。

以1944年太行区疾病状况为例:“在武安马店头全村有四百一十一人,就有三百零八人害病,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四点九强。上麻田六百零四人,害疟疾的五百一十四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其中以壮年最多,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其余为老年幼年。”^④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疫病与战争是分不开的。太行根据地是华北抗战的重要地区,战争使医疗力量更趋薄弱,加之医疗设备不足、医药缺乏,根据地军民的防疫能力大大降低;战争还破坏了根据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混乱状态。日寇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乡”“围剿”“扫荡”的同时,在根据地内大量散布病菌、毒气以及

① 《太行卫生社半年总结报告》,1949年7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52-4-124-10。

② 《垣曲县医生调查统计表》,1949年7月2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176-1-29-1。

③ 《太行行署1946年4月医药卫生座谈会纪要》,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52-4-114-1。

④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3—664页。

在井中、河中投毒，对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仅使疫病流行的范围逐步扩大而且更加频繁。“我们地区日益向外扩大，疾病却日益向内发展。就疟疾来说，1938年、1939年在冀西发生，1940年赞皇一带发生甚炽，1941年至武北直到清漳河岸，1942年、1943年到了武乡、襄垣等处，1944年又到了二分区，这种趋势，日有增加。再说汗病，1939年由河间开始传至林县、平顺，1940年、1941年，又至黎城、襄垣、左权，1942年、1943年榆社、武乡，直至现在（1945）武西仍在蔓延。”^①疫病伴随着战争在根据地内肆虐，根据地军民被迫“两线作战”。战争带来的人员损失显而易见，而疫病造成的减员亦不容忽视。

为控制疫情，减少根据地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急需更多的医生参加防疫减灾工作。对医生需求的增大和医生人数相对缺乏的状况，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向医生这个职业的流动。一些因生活所迫又无一技之长的村民纷纷加入医生的行列中。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培训与监督考评机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医生队伍管理中的无序与混乱。医者的良莠不齐，必不利于保障根据地人民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46年4月，在太行行署召开的医药卫生座谈会上，很多医生检讨了自己的行医动机。有因生活所迫投师名医的；有因小学教员的工作不保险，正好看见父亲行医的收入好转而改做医生的；有发现村里群众求医难，自学开始行医的；还有自小学毕业后无事可做，游荡中发现医生这个职业好而行医的。^②这种趋势的结果是大批医生的出现似乎暂时改善了医疗人员缺乏的状况，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医生并不是正规中医或西医培训教育出来的合格人员，医疗水平参差不齐。不合格医生人数的增加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力量不足的问题，反而使得医疗防疫力量更加孱弱，造成“有疫无防、防而无效”的局面，因此对原有医疗队伍进行整合，建立相应的疫病防治体系就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3—664页。

② 《太行行署1946年4月医药卫生座谈会纪要》，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52-4-114-1。